



華夏英才基金學術文庫

(下) 中国当代 小说家群论

ZHONG GUO DANG DAI XIAO SHUO JIA QUN LUN

黄伟林 © 著

红色经典小说家
“右派”小说家
知青小说家
晚生代小说家
地域文化小说家
女性小说家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中国当代 小说家群论

2000-2010 年中国当代小说家群论

张其成 著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70后”小说家群论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80后”小说家群论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90后”小说家群论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00后”小说家群论

中国文联出版社



華夏英才基金學術文庫

(下) 中国当代 小说家群论

ZHONG GUO DANG DAI XIAO SHUO JIA QUN LUN

黄伟林 ◎ 著

红色经典小说家
“右派”小说家
知青小说家
晚生代小说家
地域文化小说家
女性小说家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当代小说家群论/黄伟林著.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0. 1

ISBN 978-7-80109-751-4

I. 中… II. 黄… III. 小说—文学评论—中国—当代 IV. 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17297 号

中国当代小说家群论·下

出 版 人 和 龔

作 者 黄伟林

责任编辑 贾宇琰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 (100032)

电 话 (010) 66509360 (总编室) (010) 66509246 (编辑室)
(010) 66509364 (发行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book.com

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字 数 270 千字

印 张 24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7.80 元 (全二册)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 66509618

目 录

第四章 知青小说家（续）	1
三、知青地下小说和伤痕小说	1
四、理想主义	6
五、知青的反思小说	14
六、寻根小说	33
第五章 晚生代小说家	50
一、命名溯源	50
二、五大主题	56
三、叙事技巧	74
第六章 地域文化小说家	92
一、宣告乡村文化终结的贾平凹	94
二、开始都市文化写作的王朔	99
三、在边缘体验全球化的新桂军	105

第七章 女性小说家	129
一、理想爱情与现实婚姻	129
二、爱情中的性	141
三、女性的个人化写作	155
四、“一个女人与三个男人的故事”	169
五、进入重新建构的时代	182
后 记	186

第四章 知青小说家（续）

三、知青地下小说和伤痕小说

刘小萌在他的专著《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的结束语中说道：

大批知识青年下放农村，遇到一系列问题：多数青年在生活上长期不能自给，在口粮、医疗、住房、婚姻等方面存在不少困难；文化生活贫乏，许多可以造就的人才被迫中断了学业，在“接受再教育”的过程中，学到的科学文化知识却走向退化。由于“文革”法制被践踏，下乡青年的人身权利往往得不到保障，不少青年受到迫害。农村的艰苦环境，各种意外事故的侵袭，有病得不到及时医治，使一些青年英年早逝。因无节制的繁重劳动、营养不良等原因而罹患各种病症并累及终生的青年，则数不胜数。^①

^① 见《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850页。

如果说刘小萌这番话只是一个抽象的概述，那么，“文革”期间秘密传播的知青小说家创作的地下小说和新时期影响极大的伤痕小说则对知青在上山下乡运动中的各种受伤害情状作了形象生动的再现。

“文革”期间有两类知青小说，一类可称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知青小说，如江雷的《剑河浪》、郭先红的《征途》、张抗抗的《分界线》、王士美的《铁旋风》等。另一类则是非主流意识形态的知青小说。

“文革”期间非主流意识形态的知青小说也称“地下小说”或“手抄本”，由于它的非主流意识形态倾向，传播处于“地下状态”，多年后有公开出版，但大多已经散失。杨健在他的《中国知青文学史》中对这类知青小说作了一些介绍。比如郑义在1970年前后曾写了短篇小说《闪闪的红星》，写一对知青兄妹因父母受政治迫害被赶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获知父亲出狱后就在第二天偷偷爬货车回北京。货车不停地连续开了几天，到北京时，人们发现这对兄妹已经冻死了。显而易见，这个小说已经表现出了对“文革”和知青运动的否定情绪。甘铁生于1972年写了中篇小说《第二次慰问》，写的是知青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却发现上当受骗了。他们开始寻找精神食粮，阅读曾被自己批判的书籍，并与极“左”环境下的农村干部发生了冲突，并受到迫害，有的女知青甚至被强奸。其中还有关于知青生活颓废，追求感官刺激、酗酒、乱交的描写。据说这个小说的有些情节取自生活原型。从这个小说描写的内容看，知青对知青运动的否定情绪更强烈了，并且开始了精神突围。一是通过读书的理性思考方式，另一种则是以感官刺激的方式。显然，第一种方式的精神突围才可能赢得久远的价值，它也传达了知青开始独立思考的信息。王江的长篇小说《梦》完成于1973年，讲述兵团知青江晓原克服私心杂念，追求“超凡入圣”的精神历程，明显模仿《堂吉诃德》的构思，主人公经过了一个幻觉式的过程之后，又回到了现实。这个小

说一方面写出了知青确实存在的理想主义气质，另一方面也写出了幻灭的现实，蕴含着对“文革”理想的反思。刘自立在1974—1975年写了8部小说，均采用了意识流的手法，其中《圆号》、《仇恨》两篇新时期初期在《今天》第5期上发表过。《圆号》写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体验，相爱并不等于内心世界的接近，甚至无法使主人公摆脱孤独感，分手反而造成了彼此的独立。杨健写道：“这种反映内心丰富性的小说，在当时几乎无人能够理解，因为‘文革’是一个关注意识形态的时代。1978年，《今天》编辑部的编辑们曾就是否发表这篇小说存在争议，在讨论会上，有些人对这种‘无情节’小说表示异议，对人物迷乱的意识表示不解；另一些人，包括作家王蒙，则对小说表示赞许。”^①

《今天》杂志除发表了刘自立的小说外，还发表过甘铁生的《原谅我，兄弟》、史铁生的《没有阳光的角落》等知青小说家的小说。

在“文革”期间，还有一些有影响的知青小说家，如牟敦白写过《霞与雾》、《胎衣》、《脸谱》、《季风之歌》、《在船上》等小说，张扬则写了流传非常广的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

伤痕小说是新时期最早出现的一种重要的小说现象，它以反映社会时代的变动，展示社会中人的命运而归属于现实主义创作潮流。

伤痕小说指的是1977年开始出现的以“文革”时期社会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其主旨在于展示极“左”思潮对同一时期的中国人身心所造成的摧残。这一小说现象因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发表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而命名。

知青小说家是伤痕小说思潮的主力。这不仅因为伤痕小说是根据知青小说家卢新华的知青小说《伤痕》命名，更因为一大批知青小说家的

^① 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第292页。

小说成了伤痕小说的代表作。如孔捷生的短篇小说《在小河那边》、郑义的短篇小说《枫》、甘铁生的短篇小说《聚会》、叶辛的长篇小说《蹉跎岁月》、竹林的长篇小说《生活的路》等。

卢新华的《伤痕》的女主人公王晓华本是一个生活在上海的红卫兵，从小接受的是《青春之歌》这样的革命文化的教育。“文革”发生后不久，她的革命多年的母亲被定为叛徒。于是，在她心目中，母亲就成了《青春之歌》中戴愉式的人物。她因此遭到同学、朋友的疏远，红卫兵资格也被取消了。尽管她从小得到父母如掌上明珠似的溺爱，但她还是为母亲是一个叛徒而感到莫大的耻辱。从小接受的阶级教育远远超过伦理教育，她觉得自己对母亲的感情是小资产阶级感情，她必须与母亲划清界线，必须立即离开母亲，越远越好。于是，还未中学毕业，她就报名参加了上山下乡。离家之前，她给母亲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的是：“我和你，也和这个家庭彻底决裂了，你不用再找我。”就这样，她远离上海，在辽宁省渤海湾的一个农村里扎下了根。她试图用这样的方式来表明她的阶级立场和革命信念，因为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也宣传“出身不可选择，道路可以选择”的思想。在农村的王晓华努力进步，并坚决与母亲脱离关系。母亲寄来的食品和信，她都是一收到就退回。她进步很快，第二年就填写了入团申请书，但由于她母亲的叛徒问题，没有得到上级部门的批准。这一事实对她打击很大，她那颗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证明自己的革命性的心变得有些灰冷了。一同下乡的男知青小苏对她颇为关心，两人逐渐发展成为恋人。可是后来，她无意中发现，因为与她恋爱，小苏调到县委宣传部的事情遇到阻力。为此，她备受打击。过去是她的母亲影响了她的前途，如今，是她影响了她所爱的人的前途。在痛苦中，她告知上级部门，断绝与小苏的恋爱关系。在农村生活了八、九年，有一天，她忽然收到了母亲的信，她忍不住读了，母亲在信里告

诉她，自己的叛徒问题是一个冤案，已经得到昭雪，重新回到了领导岗位，由于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很希望王晓华回家看看。内心世界已经麻木多年的王晓华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直到春节前两天，她又收到母亲单位的公函，她才买票回家。到家后她得知母亲已经发病住院，待她急忙赶到医院，迎接她的是母亲去世的消息。

作为“伤痕小说”的命名之作，《伤痕》在内容上是很切合这个主题的。王晓华的母亲在“文革”中深受迫害，身心俱损，最后丢了性命，这样的伤痕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王晓华本人表面上似乎并未受过迫害，但她与母亲决裂的行为已经见出1949年后革命文化对她的世界观、人生观的深刻影响，她在内心深处服从了这种文化的“指令”，但这种文化并没有真正接纳她，由此可见，她所受的伤害也是双重的，只是看不见摸不着而已。尽管今天看来，《伤痕》是一篇很幼稚的小说，但是，它确实很真实地反映了那个年代中国青少年的教育背景和文化心理。一方面，王晓华所受的教育是很纯粹的革命文化教育，从小就被灌输阶级性、党性以及领袖崇拜的意识，这种后天灌输的意识甚至超过了几千年、几万年人类形成的血缘伦理意识，以至于当王晓华得知母亲是叛徒时可以毅然决然、义无反顾地与母亲断绝关系，亲情被彻底压抑，阶级感情、党性意识、对领袖的爱彻底占了上风。今天读这个作品，我们意识到那个时代的人性教育对人性的丰富性作了多么严重的简化和多么违背常情的引导，由于这种简化和引导，当时的人性高度扭曲、高度异化了。

然而，在《伤痕》发表的1978年，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还完全不能与今天同日而语。于是，《伤痕》成了一篇振聋发聩的小说。可以说，它全方位地突破了“文革”时代主流文学的创作模式，在诸如写真实、悲剧、爱情、人性、歌颂与暴露等多个问题上突破了文革时代甚至建国后17年逐渐形成的创作禁区。而在这所有问题中，它又因为涉及对血统论

这一伤害了许多青年人的思想观念的深刻批判，激起了广大读者的强烈共鸣。小说最初在复旦大学校园里张贴出来时，就吸引了大量校内外的读者，当《文汇报》想方设法于1978年8月11日公开发表后，到同年的11月7日，短短三个月里，就收到了近900封读者来信，并形成了一个全国范围内的长达半年时间的关于《伤痕》这个小说及其涉及问题的讨论。

郑义的《枫》发表于1979年2月11日的《文汇报》，以卢丹枫和李红钢这一对单纯幼稚、互相爱慕的青年男女在“文革”武斗中自杀、被杀的故事为主要情节，揭露了现代迷信对青年一代的戕害。这是最早从整体上否定“文革”的作品之一，发表后引起广泛争议。

老鬼的《血色黄昏》也是影响很大的知青小说。这部小说写作时间早，但公开出版时已经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作者试图原生态地展示知青生活历史，具有一种直面历史的勇气。这一点殊为可贵。

四、理想主义

红色经典小说家是在一个文化相对开阔、阶级斗争剧烈的年代开始他们的启蒙教育的。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共同点是他们大都身处底层，所以很自然地接受了阶级斗争学说。“右派”小说家在国家沦陷的状态中长大，对国家的贫弱有刻骨铭心的认识，所以他们很自然地接受了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知青小说家是在20世纪50、60年代接受基础教育的。这时候的文化出现了一种“缩减”的趋势。一方面是“旧文化”不断受到清理，文化的多元化状态逐渐消失，形成文化一体化局面；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文化”极度弘扬，这里的社会主义文化是以清除“旧文化”为前提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民族国家学说成为其核心。当一种文化失去

了开阔的生长平面，它就开始向“高空”发展，这种向“高空”的发展趋势，其实就可以理解为那个时代的理想主义。

理想主义是知青小说家无法回避的一种心理情结。这个情结是他们接受启蒙教育的时候上一代人为他们“系”上的。就像传统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中总有四书五经的痕迹，知青一代的文化心理结构免不了存在毛泽东思想的影响。无论从理论表达还是从现实实践，毛泽东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同时也是知青一代惟一的偶像。他的巨大成功、思想、人格魅力以及体制力量使他的思想强有力地进入了知青一代的头脑，造就了新一代的理想主义者。阿城的《树王》有一个很典型的细节，一群知青进了山沟，其中有个好读书的名叫李立的知青带了满满一箱需要四个人才抬得动的书，大家不由很好奇，打开来看，只见……小说这样写道：

原来都是政治读物，四卷雄文自不必说，尚有半尺厚的《列宁选集》，繁体字，青灰漆布面，翻开，字是竖排。又有很厚的《干部必读》、《资本论》、《马恩选集》、全套单行本《九评》，还有各种装潢的《毛主席语录》与林副主席语录。大家都惊叹李立如何收得这样齐整，简直可以开一个图书馆。李立慢慢地说：“这都是我父母的。我来这里，母亲的一套给我，父亲的一套他们还要用。老一辈仍然有一个需要学习的问题。但希望是在我们身上，未来要靠我们脚踏实地去干。”大家都感叹了。支书看得眼呆，却听不明白，问：“看这么多书，还要学习文件么？”李立沉沉地说：“当然。”支书拣起一本书说：“这本是什么？我拿去看看。”大家忍住笑，说这就是《毛泽东选集》。支书说既是毛选，他已有两套，想拿一本新的。李立于是拿了一本什么给他。

阿城在这里呈现的，就是知青一代接受教育的文本。它造就了一种怎样的人格观念形态呢？筱敏在她的散文《这一代以及那一代的理想》中曾有过一番比较符合实际的概述：

我经历过一个全体青少年都渴望当兵打仗的时代，今天看过去它不免荒诞，但当时的一切都是有本有源，顺理成章的，那是一个生活有如舞台布景，被装饰得如火如荼的时代。

绿军装风靡全国，成为青少年们惟一的，具有绝对统领地位的流行时装，这种整齐单一的审美趣味，自然源于这一代人所获得的整齐单一的教育。炸碉堡堵枪眼之类的英雄主义行为，雪山草地的浪漫主义传奇，是自幼年以来一直喂养我们的食品，比起异域的童话，这种喂养是不由你个人或家庭选择的，它带有统摄性和强制性，接受是一种义务。那种整齐单一的着装趣味，并非仅为审美的尺度，而更是道德的尺度了。

这一代人唱火药味十足的歌，由衷地相信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正等待着我们去解放，这一代人觉得生在和平年代是一件遗憾的事情，甚至连“和平”这一类的字眼都是懦弱的，带有“修正主义”气味的，因为它使人生平庸，何况它几乎总与“演变”这样可耻的字眼连在一起。“我们这一代青年将亲手参加埋藏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这样一类名言的流行程度可以压倒当今任何一支流行曲，这一代人无论从高音喇叭里听到它，还是从友人来信中看到它，都无不为之动容，从而进入一种躁动不安的梦境状态。革命的饥渴，战争的饥渴，献身的饥渴，伴随着青春期特有的饥渴，使这一代人如浸没在狂潮之中，没有立足点，也不肯沉没，于是便不断地翻卷，涌动。我们可以从当年流传下来

的诗文中，看到那个时代的生命标本，比如当年广为传抄的政治抒情诗《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①

无论是阿城的小说还是筱敏的散文，呈现的都是知青一代所受教育的现实。他们接受这种教育长达10年、甚至20年。这种理想主义的内容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做人”的理想，所谓做“社会主义新人”；另一方面是“救人”的理想，所谓“解放全人类”。这种理想主义抽象地看是无可非议的，但具体内容却存在很大的问题。于是，理想主义表现在知青一代身上，就出现了形式与内容的分别。就形式而言，知青长期接受的理想主义教育培养了他们的理想主义气质、姿态、习惯，对此，他们常常表示青春无悔；就内容而言，选择什么样的理想，如何对他们当年的理想进行反思，就成为这一代有了思考习惯的小说家耽于思考的问题。

比较一下红色经典小说家、“右派”小说家和知青小说家这三代小说家的思想观念形成原因也许很有必要。红色经典小说家和“右派”小说家都经历过战争年代，对民国时代的中国有过较为深刻、直观的体验，他们对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背叛是主动的。他们革命的动力是一种生活动力。相比之下，知青小说家“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他们对“旧中国”并没有直观的认识，他们是从书本学习、从理论学习中接受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体系的。他们革命的动力往往是理论的动力。这是知青小说家与前面两代小说家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如果我们认真阅读三代作家的文本，就会发现，前面两代作家多长于叙事，拙于说理，生活经验在作品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形象思维的能力大于抽象思维的能力。知青小说家则不然，他们的写作往往有比较明确的观念意识。正因为他们有这种理论气质，

^① 该文收入筱敏随笔集《阳光碎片》，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

所以，新时期大部分小说思潮都是由他们发起。而且这种发起多不是理论家事后的总结，而是以意识明确的理性思维作为前提的。

这一点很重要。我们知道，革命历史小说虽然写的是革命的历史、革命的主题，但他们的写作是以革命的实践为材料的，这个革命因为已经取得了现实的成功而证明了它的正确性。所以，红色经典小说家在创作革命历史小说时往往只重事实不重道理，这固然与红色经典小说家的文化素质有关，但也因为这个道理已经不证自明，即使要证明仿佛也是在证明“公理”，所以我们发现革命历史小说的主题思想都是同一的、千篇一律的。我们因此说它缺乏思想性。“右派”小说家进入写作时面对的是革命取得巨大成功之后不久的建设时代，巨大成功使革命的合法性显得不容置疑。“右派”小说家不是没有思想，而是在一个庞大的革命实践面前来不及思想。当然，这种来不及也是有原因的，如我们说过的，“右派”小说家在一个更大的体系中完全属于左翼作家，他们对革命的整体是无所非议的。他们的批评往往是针对革命的某些局部问题，像《重放的鲜花》中许多作品都批评了革命中存在的官僚主义现象。

但知青小说家面对的革命就不一样了。这时候的革命是一个尚未得到实际证明的革命，甚至是一个无法得到求证的革命。因为这时候的革命已经从社会革命发展成为人的革命。毛泽东力图培养的是“社会主义新人”。知青小说家所受的教育只是从理论上证明这个革命的必要性、合理性、逻辑性。这也就养成了知青小说家理论思维的习惯，这种理论思维是整体的而不是局部的。

理论思维必然要求理论书籍的营养。尽管 20 世纪 50、60 年代的中国处于一个思想一体化的年代，但一批“黄皮书”的存在还是为思想突破现实的牢笼提供了机会。杨健的《中国知青文学史》就专门写到一个知青小说家的思想转变原因：

刘自立在 1968 年结束了他的“文革”政治情结，开始转向艺术。刘自立的父亲在中宣部从事党的理论工作，曾参加中共中央“九评”写作组，是“中央反修小组”的成员。刘自立受家庭的影响，对政治理论很感兴趣。在上初中二年级时，就看了《列宁传》，后来又看了《国家与革命》、《德意志意识形态》等马列专著。“文革”开始后，他同中宣部的子弟成立了一个造反小组，积极地投身“文革”运动。可是运动开始不久，刘的父亲被迫害致死。头一天人还关押在中宣部的四楼，第二天上午就接到了人已“自杀”的通知，下午即送来了火化的骨灰。刘自立接过骨灰盒，骨灰似乎还在发热。学校对立的一派攻击刘自立出身不好，他便贴出大字报，提出毛泽东、马克思、恩格斯的家庭出身都不是无产阶级。刘自立因此犯了“恶攻罪”，成为当时的“69 名狂热分子”之一，被关押在半步桥监狱。半年后，经毛泽东批示，包括刘自立在内的这 69 人被释放。

刘自立说，在当时有一本“黄皮书”深深地启发了他，这就是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为奥地利籍经济学家，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哈耶克在 1943 年针对纳粹德国的崛起，明确指出，纳粹党提出的“社会主义”是“通往奴役的道路”。哈耶克作为一名自由派经济学家，主张让“无形的手”来调节经济，并因此发展出他的政治观点：人类的存在状态不应由某一党派提出的思想来预设，人类追求理想的直接结果，是把人类引向地狱。这本针对纳粹主义的书，在刘自立看来像是针对“文化大革命”写的，他意识到“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乌托邦。这本书对刘自立震动很大，他放弃了政治，将注意力转向艺术领域。

尽管像刘自立这样的人在知青一代是很少的，但作为一个典型，他的